

日本的軍国主义

(軍国主义和帝国主义)

第二册

井上清著

商务印书馆

日本的軍国主义

(軍国主义和帝国主义)

第二冊

井上清 著

尙永清 譯

商务印書館

1958年•北京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日本进步历史学家井上清所著“日本的军国主义”一書的第二册一些历史資料和文献,对日本明治維新后天皇制軍国主义和官僚独裁政治的确立和發展,作了比較深刻的分析。本書分为三篇:第一篇探討明治政府所采取的一面屈服于西方列强一面侵略东方鄰国的政策的历史根源;第二篇分析甲午、日俄兩次战争的性質和壟断資本主义在这兩次战争中間的形成过程;第三篇闡明日本軍国主义在西伯利亞对偉大社会主义革命进行武裝干涉的失敗就是日本軍国主义崩潰的預兆。

本書可供历史研究者参考,也可供一般讀者閱讀。

本書根据 1953 年日本东京大学出版会 出版井上清著
“日本の軍国主义Ⅱ——軍国主义と帝国主义”譯出。

日 本 的 軍 国 主 义

第 二 册

井 上 清 著 尙 永 清 譯

商 务 印 書 館 出 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 10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107 号)

新 华 書 店 总 經 售

京华印書局印刷 龍門裝訂厂裝訂

統一書号 3017·4

1953 年 7 月初版

1958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張 7

開本 850×1168¹/₃₂

字數 184,000

印數 1—3,000

定價(7) ¥ 0.75

序 言

目前我国正在加速进行重整军备，军国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大大地复活了。这种军备和军国主义隶属于美国帝国主义，是美国帝国主义的雇佣军，所以和过去的军备和军国主义截然不同。从而在新旧的军队和军国主义之间也就产生了种种的区别。

然而认为目前的重整军备和恢复军国主义仅仅是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从而看不见它是为了日本统治阶级本身的利益而服务，看不见它也是统治阶级为了恢复“大日本帝国”的野心而利用的手段，那就大错特错了。

目前的军备和军国主义同过去的军备和帝国主义不可能是没有关系的。它们既然都是建筑在天皇制、半封建的农业生产关系、垄断资本主义这些共同的基础上，当然就会产生出共同的性格来。因此，为了反对目前正在复活的军国主义和重整军备，为了争取民主主义与和平而斗争，对过去的军队和军国主义加以历史的研究，将是十分有意义的。

根据以上的看法，从我所研究的过去的日本天皇制军队和军国主义的论文中，选出了六篇，分作两册，以“日本军国主义”为题而出版。其目次如下：

第一册 天皇制军队和军部

第一篇 幕府末期的兵制改革和民兵的萌芽

第二篇 天皇制常备军的建立

第三篇 军阀和政治

第二册 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

第一篇 征韩论和军国主义

第二篇 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

——日本帝国主义的成立——

第三篇 对偉大社会主义革命的武裝干涉

——日本帝国主义毁灭的預兆——

以上六篇中，第二册的最后一篇論文曾在“历史学研究”杂志151号、153号上發表过（1951年5月、9月）。第二册的第二篇是在1950年秋为历史学研究所編“近代日本の形成”写的初稿。

除了以上兩篇以外，其他論文都是在这里初次發表的。第一册的头兩篇是在二十一年前即1932年写的。这是我第一篇学术論文，曾蒙羽仁五郎先生給以热心指导。但是在当时是无法發表的。战后，日本軍隊已經瓦解，因而認為再發表它的創建史已經沒有意义了。但是不幸得很，現在又有了这种意义，因此便对原稿稍加修改，予以發表。

第一册的第三篇是这次新写的。

1940年，即所謂“皇紀二千六百年”进行天皇主义大运动的那年春天，每日新聞社为了配合这个运动，把德富苏峰的“昭和国民讀本”的一部分版稅作为獎金，以“征韓論の真相及其影响”为题征文时，我曾应征，写了一篇論文，但根本沒有入选。这篇論文現在編在第二册內，作为它的第二篇文章。

我所以在这种軍国主义的法西斯的有獎征文下应征，是为了單人匹馬地杀入敌陣的核心。同时也以为既然有尾佐竹猛博士、辻善之助博士等人担任审查員，如果是一篇彻底有实証的、具有充分史料根据的論文，即便是批判軍国主义，也可能通过。但是这篇論文在苏峰的門人們預选时一下子就被淘汰了；正式的审查員根本就沒有寓目。后来我不禁苦笑：自己未免过于天真了。写这篇論文时，得到友人宗京獎三君很多帮助。

这篇論文在苏峰的审查下虽然落选了，但是現在我为了請反对軍国主义的人民来审查，特地再發表出来。这篇論文的一部分，过去曾以“两个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为题在“历史学研究”上發表过。

本書如果对讀者多少有些参考价值，便万分荣幸了。

井上清 1953年6月10日

目 次

序 言	i
第一篇 征韓論和軍国主义的确立	1
序 章 明治維新的对外任务	1
第一章 屈服和侵略	14
——明治政府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針——	
第一节 对强者的屈服	14
第二节 “国权外交”	19
第三节 侵略中国之夢	27
第二章 野心的焦点——朝鮮	35
第一节 明治前的日韓关系	35
第二节 征韓外交	43
第三节 朝鮮“侮日”的真相(一)	50
第四节 朝鮮“侮日”的真相(二)	55
第三章 关于征韓的爭論	65
——士族軍国主义和官僚軍国主义——	
第一节 征韓論的意义	65
第二节 西乡、板垣派的立場	72
第三节 大久保、木戶派的立場	86
第四章 軍国主义的确立	90
第一节 明治6年10月的政变	90
第二节 官僚独裁政权的确立	95
第三节 征韓派——士族軍国主义的去向	99
第四节 新軍国主义	103
第二篇 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性質	111
——日本帝国主义的确立——	
第一章 甲午战争的本質	111
第一节 誰是主角	111
第二节 客观条件	116
第三节 开战的时机和战果	121
第二章 資本主义的确立和农業的变化	127

第一节 工業資本主义的發展	127
第二节 农業的变化	131
第三章 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	138
第一节 壟斷資本的早产和对大陆的野心	138
第二节 世界和日本	147
——走向帝国主义的道路——	
第三篇 对偉大社会主义革命的武裝干涉	160
——日本帝国主义毁灭的預兆——	
序 章 米粮暴动和侵犯西伯利亞	160
第一章 武裝干涉的主角	162
第一节 外务省和参謀本部	162
第二节 西伯利亞緩冲国的幻想	169
第二章 “二重外交”?	174
第一节 种种的反对	174
第二节 出兵	181
第三章 不可避免的失敗	190
第一节 軍事和政治的矛盾	190
第二节 革命的力量	197
第四章 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	207
第一节 庙街事件和庫頁島的占領	207
第二节 帝国主义毁灭的預兆	213

第一篇 征韓論和軍国主义的确立

序章 明治維新的对外任务

幕府末期，明治維新当时，日本所面临的历史任务是对外要从欧美列强的压迫下把日本国家和日本人民解放出来，建立独立自主的主权，另一方面要消灭封建鎖国排外主义及其另一表现形式——領土侵略主义，并广泛同世界各国建立互不侵犯、平等互惠的友好关系。

明治政府屡次提出“国权外交”的口号，但这一口号只有在完成上述历史任务的范围内才可以說是正确的。

然而，怎样才能达到所謂独立自主呢？明治政府的中心人物之一佐佐木高行在明治4年(1871)4月28日的日記內写道：“凡是稍具远見的人都說：国内人民如果不能平等，国威就不能揚于海外。”(見“明治聖上和臣高行”一書)。就連專制官僚首領木戶孝允也說过：“人人自立，其国自然独立。”(明治10年11月3日致三浦梧郎書)。可是，为了完成維新的对外任务，基本条件是首先确立国民的独立自由。在确定明治政府是否做到这一点以前，且先来看一下維新前的日本同欧美的关系和东亚的大势。

旧幕府的武士貴族，在国内对一般人民行使絕大特权。正因为如此，对西洋各国則完全軟弱無能。不仅幕府及其封建势力搖搖欲墜，甚至整个日本几乎变成欧美各国的半殖民地，独立自主的国权已經不复存在。

卑鄙懦弱的德川幕府，为了維持幕府各藩的封建制度而牺牲了国民的进取精神和日本国家的进步，閉关自守，甚至禁止制造大船。对内用士农工商穢多非人^①的身分制度、村落制、五人組

^① 穢多非人是江戸时代所謂不从事劳动生产的賤民。——譯注

制^①、行会制等等来束縛人民。对农民則肆無忌憚地实行“榨胡麻油”式的剝削，同时“禁止一切新創举”，甚至压制所有的独立思考。他們竟然这样害怕历史的进步，以一个武士对十个百姓的比例在国内施行鎮压，自夸天下太平。殊不知他們所說的太平，乃是把社会的停滯錯認爲政治的安定了。

然而“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世界在这个时期已經完全改变了面貌。

江戸时代初期，幕府在各省乡村頒發布告：“农民不得食米，应以甘薯叶、豆叶为常食，以米上貢，飲茶的女人其貌虽絕美，也应与之离婚。”但同年，即 1649 年（安永 2 年），英国已經确立了議會政治制度。

十八世紀末，英国發明蒸汽机和紡織机，飞躍地完成产业革命。此外，还有美国的独立自由宣言和法国的大革命，以及这些国家的产业革命等等，到处都建立了近代的民主国家，代替了封建專制。資本主义的大工业和世界性的貿易經濟波瀾壯闊地發展起来，代替了閉关自守的小規模孤立分散的农业和手工业。

欧洲人之經略亞洲，正是因为他們国内有了这种發展，而發展最快的英国终于先后排挤了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法蘭西等国，到十八世紀末成为欧亚兩洲的胜利者。当时整个印度已經处于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的支配下了。

进入十九世紀后，英国急于建成新的殖民地統治体系而徹底破坏旧印度，随即对中国發動鴉片战争，强迫清廷接受南京条約，割讓香港，开辟广州和上海等五个商埠，建立治外法权和締結关税协定（1840—42）。从此以后，中国变成了欧美各国的半殖民地。

亞洲北部被称为“欧洲野蛮国家”的罗曼諾索夫王朝的俄罗斯，以强大的武力弥补它落后的經濟侵略，猛烈向东擴張。当十八、十九兩世紀之交，它已把实力擴張到白令海峽，沿中国东北海岸南下，在千島、庫頁島开始与我国势力發生冲突。十九世紀中叶，沙皇俄国也完成了产业革命。1847 年（弘化 4 年）穆拉畢耶夫

① 五人組是江戸时代的一种压迫人民的連帶責任制的組織。——譯注

出任东部西伯利亞的总督，其后的远东經營开始有了本質上的变化。

幕府各藩臣对这样的世界形势、尤其是东亚的形势，没有任何明确的远见和确定的对策。相反地，以莫須有的罪名把那些热心研究世界文化和世界形势的学者林子平、高桥作左衛門、高野長英、渡边华山等先驅——处刑，称西洋人为夷狄禽兽，且侮且惧。下令，凡遇西洋船只，即便运送海上日本漂流难民的船只也“一律”燒毀。同时也命令，对沒有肇事企圖的船只可以供給用水和燃料，使其平安离去，可見方針搖擺不定。

鴉片战争期間，長崎的市政官吏高島秋帆認為清廷的失敗就是日本的危机，不忍坐視，决心建議幕府采用近代武器及炮术，在江戶郊外演習新式軍事教練。江川太郎左衛門等其他有志之士深为感嘆。可是，幕府的槍炮技師們硬說西式兵术不合实用，加以卑鄙的漫罵。不久，秋帆被扣上走私者和擅自練兵等罪名而入獄。水戶烈公^①主張采取夷狄之長，在藩內延聘蘭学家^②兴建鑄造槍炮用的反射爐。表面看来，他好像是位先驅，但他又决不許民間自由研究蘭学，主張必須严禁。水戶藩的指導者会澤正志齋在文政末年曾發表一篇“新論”，主張采取夷狄的長处，但当水戶藩決定兵士一律使用槍炮时，却上書激烈反对，說模仿蛮人兵法就是喪失大和魂（參照水戶藩史料別記）。

既然被称为先驅的部分執政者都是这种情况，难怪 1853 年（嘉永 6 年）陪利^③艦隊來寇时，幕府当局固不必說，即便受諮詢的諸侯以下人等，也完全拿不出堅定的对策，因而陷入陪利的“誑騙”政策之內，不得不和清廷一样簽訂安政開港的屈辱條約。

不久，到 1861 年（文久元年），我國領土也有了被侵略的危險。

① 即水戶藩主德川齊昭。——譯注

② 江戶時代中期以後，學習荷蘭語，通過荷蘭語研究西洋學術（包括醫學、數學、兵學、天文學、化學等）稱為蘭學。——譯注

③ 陪利（Matthew Calbraith Perry）是美國海軍軍人，1853 年率領東印度艦隊來到日本的浦賀，要求幕府開辟商埠通商。1854 年再度來到橫濱與日本簽訂了“修好條約”。——譯注

对馬島是东亚海上的要冲，列强早就注目，特别是沙俄，它根本不重视对我国的贸易，而是虎视眈眈地企图伺机占领北海道和对馬。

1861年3月，沙皇军舰“波萨德尼克”号借口修舰开入对馬島的芋崎浦，任意砍伐山林，建筑房舍，实际上已将该地占领，然后强迫该岛领主对馬守宗氏让其永久租借这一地方。幕府急忙派外交长官小栗（丰后守）前往交涉，以便使该舰退走。然而小栗到对州（即对馬島）后，竟向俄人屈服，甚至允许舰长提出的会见藩侯（即对馬守宗氏）的要求，发给他会见的文件。小栗并没有将此事通知对州人，摆摆官架子就匆忙返回了。后来，舰长持小栗的文件要求同藩主会面。对州的全体人民对小栗的这种卑鄙行为非常痛恨，但已无可奈何。

对州藩认为这是宗氏族的存亡之秋，促请武士和平民必要时对俄人进行决死抵抗。然而是否出自真心，颇有疑问，因为对州藩于5月向小栗提出的“商讨书”里说：“芋崎一带事实上已经成为彼等领土，长此下去，势必扩张地盘，这是毫无疑问的”，当此危急之际，“公虽欲使彼等今后不来，岂非难事”。可见，这根本是一种失败主义，于是请求说：“事已至此，希望我公拨浅海之地作为补偿，或者年年给与大致与该地出产额相同的粮谷，或一次补偿，钱、粮均可。”

这样做，对宗氏一族或对州的藩士来说，也许是一条生路，然而对日本和日本人民来说又如何呢？只有对馬島的人民，才对不法的侵略者拚命斗争到底（关于这一点请参看本书第一卷第一篇论文。拙著“明治维新”、“日本现代史第一卷”也有这一事件的详细论述）。

幕府并没有就这件事呼吁全国人民的协助，而是把它隐瞒起来，求援于英国舰队。英国认为对馬島被俄国占领，对己不利，乃强烈要求波萨德尼克号撤退。在这期间，对馬島民，直到国际对立发生为止，一直英勇奋斗，阻止该岛变成租界和基地化。半年后，俄舰终于撤退了。这一事件在4、5月间国内已经盛传，但攘夷党

的志士一直熱中于對外國人的暗殺，因而沒有一個人前去援助，或組織援軍。他們只是闖進江戶的對州藩邸辱罵他們軟弱無能。有的人根據占卜術相信俄艦撤退，聊以自慰（文久元年6月2日，久坂玄瑞的信，真木保臣的“南遷日錄”）。

1830年初，朝鮮也有洋船要求通商。中國和日本開港後，這個國家也遲早難免發生事變。但朝鮮當局毅然採取排外攘夷主義。尤其是朝鮮的最后一个國王——李大王即位後（1864年，日本的元治元年），執政大院君頑固地執行強烈的攘夷主義，首先想消滅國內的天主教徒。十八世紀後半期，朝鮮從中國開始傳入天主教，雖然經過數次的大鎮壓，但天主教並沒有屈服，反而有了更廣泛更深入的發展。這時，法國人貝爾奴、達布路易等數名傳教士潛入朝鮮傳教，信徒已達三萬人。

大院君在李大王即位第三年（1865年）1月，首先逮捕貝爾奴等三名洋人，梟首示眾，然後在全國範圍內開始大批殘殺教徒。殉教者達一萬人^①。朝鮮的對外危機因此而起。

好容易逃到天津的兩名法國傳教士，向法國遠東艦隊司令官羅茲及駐中國公使貝洛內報告朝鮮事件。公使立刻向清廷交涉，取得了清廷對朝鮮內政外交概不負責的聲明。於是，貝洛內發出豪言：“朝鮮國王對我國不幸公民下毒手的日子，也就是他統治朝鮮的末日，”又揚言“朝鮮民眾盼望我們給予解放。我們將支配秩序、正義和繁榮”^②。他不等待本國的命令就派羅茲率領六艘軍艦開往江華，向朝鮮政府交涉，懲辦殺害宣教師的人犯並開港通商。

法國艦隊於同年9月駛抵江華，數百名陸戰隊兵士從江華南門登陸，佔據京畿要衝達一月之久。但是，他們因受到朝鮮獵民組成的勇敢的狙擊隊的奇襲而折兵，又因江華海上有結冰之虞，乃于

① Papers relating to Foreign Affairs(U.S.A.)1871,China despatch.

這是1871年美國艦隊到朝鮮時，登艦訪問的朝鮮信徒所說的數字。美國公使羅從種種角度證明，這番話是可以充分信賴的。根據朝鮮史料，被殘殺者達二十萬人。參照“朝鮮史大系最近世史”。

② Griffis: W.E.:“Corea,the Hermit Nation” pp.378,foot-note

關於這件事的前後敘述，參照朝鮮總督府編“朝鮮史”第六編之四，“李大王史”。

10月5日撤退。大院君陶醉于胜利，益發“坚定攘夷保国的信心”。当时朝鮮对洋船也决定一律加以燒毀。两个月前，美国商船夏曼号在大同江擱淺时，即被燒毀，船員也悉遭慘杀。同时，严禁使用和携帶洋貨，并屢次搜查(李大王朝史)。

为了抵抗欧洲各国对远东的压迫，日本、清廷及朝鮮都在实行“攘夷”。然而这种仅从視夷狄为禽兽的封建排外观点出發的斗争和杀害洋人的办法，反被貪婪的英、美人利用，乘机从我国人民手中掠夺賠款，压低关税并在我国国内駐扎軍隊等等，給我国人民造成了进一步受压迫受屈辱的因素。于是，所謂志士們便認為不能退守，必須进攻，紛紛主張向海外擴張势力，侵略朝鮮和中国。

例如，吉田松陰說：“現在要加紧进行軍备，一旦軍艦大炮稍微充实，便可开拓蝦夷^①，封立諸侯，乘隙夺取勘察加、鄂霍次克海，曉諭琉球……責难朝鮮，使之納幣进貢，和古时强盛时一样。北則割据中国东北的領土，南則掠取中国台灣以及菲律賓群島，然后“爱民养士”(吉田松陰全集第一卷“幽囚录”，普及版)。又如，日本同美俄兩國締結友好条約后，1855年(安政2年)4月，吉田松陰从获^②的野山獄將“獄是帖”寄給其兄，作为“同志的一致意見”，他在上面說：“我与美、俄的媾和，既成定局，不可由我方决然背約，以失信于夷狄。但是必須严訂章程，敦厚信义，在这期間养蓄国力，割据易取的朝鮮和中国东北，在交易上失之于美、俄的，应用朝鮮和中国东北的土地作为补偿”(同上全集第八卷所收)。

他夢想把封建主义在資本主义的侵入和交易中遭到的損失，借助于掠夺土地和在这些土地上封立諸侯，即借助于把封建制度推广到海外去的办法来取得补偿。但是，如果說对容易攫取的朝鮮和中国东北可以完全不講信义，那末这样取得的土地也必將在“交易中”被欧美資本主义夺走。这里可以典型地看出，海外擴張、侵略中国和朝鮮的主張，乃是攘夷主义的一个方面，这是从封建主义中产生出来的一种封建主义海外擴張論，这种东西不能用来同揚

① 即北海道。——譯注

② 長州的首邑。——譯注

弃了封建制度的欧美各国相对抗。

与松陰齐名的幕府末期的名士桥本佐内在他的“日俄同盟論”中也說：“加上現在力量不足，無法同西洋各国的兵力匹敌和进行長期战争，不如暫且結为同盟”。他認為选俄罗斯結盟最好，因为“我国孤立，不能对抗西洋同盟各国，如果有俄国作后援，即便战敗，也不至完全灭亡”。这样就完全令人無法相信他的主張，是具有独立自主的气概和信心，并在战略上利用英、俄对立的策略（安政4年10月28日，致村田氏寿的信，“桥本景岳全集”新版上卷）。

胜海舟在1862年（文久2年）11月同横井小楠談話時說：“取消閉关自守的論調，是不能采用的。人心如能一致，西洋又何足惧。倘在字內爭雄，若無威权，恐怕連閉关自守也办不到了”。他又說杀伤夷人并非攘夷，“当今急务首先在于兴國大業”。可見，这两个人不愧为有远見的人。然而，这里所說的“威权”，不應該是幕府專制的威权，而應該指的是国民威权。因此，規避討伐幕府的“兴國”之策，实际上是封建制度的“兴國”之策，他和吉田松陰一样，也是海外侵略主义者，他們的具体主張就是征韓論。

海舟日志1863年（文久3年）4月2日記載胜海舟对常州的桂小五郎（即木戶孝允）和对州藩的大島友之允說：“現在应由我国派遣船艦，向亞洲各国君主游說合縱連橫，共同壯大海軍，互通有無，研究学术，免受西洋的蹂躪。应当首先說服鄰國朝鮮，其次是中国”。據說桂小五郎等对此深表同感。單看这一段話，可以說“攘夷必須首先兴國”向前迈进了一步，無可非議。

但数日后，又有这样的記載：“向司农監察解釋征韓之大义。今日城中有此議論，俗吏大嘩，皆不同意”。又說：“大島友之允來。征韓之議，因循不決，嘆息时机之將失”。遇到俗吏的嘩然，便大失所望，还談什么兴國的大志呢？况且，如果是和平的、文化的日韓同盟，我想俗吏們也不会反对。征韓兩字，顧名思义，就是征服朝鮮，所以連俗吏也不能贊成。胜海舟的意見，总起来說，不外乎先向朝鮮提議建交和結盟，如不从，就予征服。胜海舟本人虽然沒有这类記載，但傾听他的議論的大島友之允却是說过的（参照大島家文書

拔粹(抄本),原本三著“征韓論和明治6年10月政变”“历史学研究”)。

这种議論,在造成1863年8月政变尊王攘夷派势力占优势时期,是作为把幕府的危机轉移到对外問題上去的反动議論而出現的。这与当时的老中^①板倉侯的儒臣山田方谷屢次向其君主献策“轉內訌为外征,把士气(即討伐幕府的士气)轉向对外”的征韓論是相同的。所以,虽然俗吏反对,但老中板倉仍然要实行。这在第一章另有叙述(参照“方谷先生年譜”“德川庆喜公傳”四)。

因此,按对州藩的征韓論,其实是假借征韓名义,請求幕府撥給“軍糧”而已。这一点,参看“方谷先生年譜”即可了然,此外,对州藩吏安达土肥之亮向藩厅报告朝鮮情况的报告序言部分,也坦率地透露了这一点。报告書說,由于对藩疲弊,文久3年(1863)請求幕府撥粮补助,但因其他藩侯也有类此請求,“按幕府內意,除非征韓,否則难于照准,不得已乃以此为理由”云云。

幕府末期的一切攘夷論,并非絲毫都不包含进步思想。陪利来寇以后,幕府提出的开港論,實質上不过是敷衍地为对外屈辱辯解。为了反对这种辯解而提出的攘夷論中,也反映了人民对外独立平等的要求。因此,長州藩的久坂玄瑞看破長井雅乐的“航海远略”是对幕府的一种調和論时,便于反駁,提倡攘夷,同时也充分認識到海外交通和海外貿易的必要性(文久元年6月22日,久坂玄瑞致入江子远的信)。例如,推崇高杉晋作的土佐藩浪士中岡慎左郎,認為“攘夷”兩字意味着类似美国独立战争那种民族独立战争(尾崎卓尔著“中岡慎太郎先生”)。

总之,依靠封建主义或依靠封建主义的加强来真正地抵抗欧美,是办不到的。必須首先打倒武士的独裁專制,建立和欧美同样或更高的国民秩序和权威。只有依靠人民的力量才能抵抗外敌,这是对州事件所証明的。1863年夏,在長州炮击外国船艦时,高杉晋作就曾道破:“非肉不饱的武士不能担当大任”,他認為唯一可以依賴的,是人民的力量,打破封建的身分制度,把被称为“穢多”

^① 幕府的最高執政官。——譯注

而受到卑視的人民也組織为軍隊，一旦發生对外战争的危險时，准許全体人民自由武裝，自由制造武器。長州借助于庶民的力量，不仅打开了对外的危机，并且击潰了 1865 年从四面八方进攻的幕府諸藩的封建武士軍隊。

中国也一样，清廷对欧美并没有进行任何有效的抵抗，但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对内則打击清廷的压制和地主的剝削，同时迫近長江沿岸，使欧美的殖民地統治者为之胆寒。英、法之所以不敢对我日本恣意施行压迫，原因之一就是受了太平天国的牽制。久板玄瑞在他 1862 年著的“解腕痴言”中說：“英法所以不敢逞虐，对皇国动武，实因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威势甚强，如太平天国向英、法屈服，英、法必然进寇我国”。英法虽然鎮压了太平天国，但是由于在中国尝受困苦，認為对日本用武并非上策，对日政策必須慎重^①。

在亞洲最落后的国家朝鮮，迫使侵入江华的法国艦队撤退的，也不是兩班貴族，而是平民的獵师。朝鮮国民的大多数农民，被称为“馱重載的牲畜”、“政治上的零”。但是他們不仅抵抗外敌并且在国内起来反对封建統治。自哲宗末年起至李大王初年，朝鮮民众为抵制压迫，曾經屢次發动大規模的民乱。尤其是哲宗 12 年（1860 年日本万延元年）朝鮮八个道到处爆發人民起义，光大規模的起义就有二十次，甚至地方官都企圖叛乱（朝鮮史第六篇之三、四）。在这类民众之間，天主教和东学的繁荣，是理所当然的事。这两种宗教虽然教义相反，但都是群众希望打倒封建制度和景仰天国的表現。天主教徒早就主張聘請洋人、門戶开放和信教自由等国内改革，早在純祖元年（1801 年，享和元年）就發生过黃嗣永关于这种主張的斗争^②。

在我国維新当时，这类朝鮮民众中間有人想到維新的日本来

① Alcock; R.: The Capital of the Tycoon; Narrative of the years' residence in Japan.

关于英国的对日綱領，參照拙著“明治維新”。

② 參照石井寿夫著“論黃嗣永的帛書”历史学研究十卷一，三号。

求援。1868年(明治元年)閏4月,朝鮮天主教徒朴根基和徐景端听說日本摆脱封建閉关自守的旧習和“洋人与倭国通商”,想求援于我国,同洋人連絡,来到釜山附近,想伺机潛入当地我国对馬藩的商館(倭館),但不幸被捕(李大王朝史5年閏4月)。有人認為,这种教徒的动向最后必然导致在政治上屈服于欧美或其他外国,这是不正确的。这一点,可以从天主教徒洪秀全等非但没有成为欧美的走狗,相反地却成了最尖銳、最徹底地反对欧美的唯一的中国势力这一事实中推断出来。

然而,当时东亚最进步的国家日本如能对內与勇敢爱国的国民大众共同用革命方式推翻封建制度,确立人民的民主自由和平等,那末对外也必能在欧美諸国面前保持独立自主的国权。这种独立自主的、平等的日本,如果向勇敢爱国的朝鮮和中国人民大众伸出友好互助的手,那末实际上这一定会比夺取朝鮮和中国东北土地的陰謀以及內心企圖加以征服的修好提議对日本更为有利。

然而,现实并不如此。国内人民沒有自主平等,对外沒有独立的国权,只是企圖向欧美屈服和侵略朝鮮、中国。

明治維新是向前迈进了的偉大的一步,旨在推翻幕府,取消大名制度,把全国統一成为不可分割的国家,并依靠独立自由的人民来确立独立自主的国权。然而它的第二步,却裹足不前了。

維新政府最高和一貫的指导者大久保利通,于1868年(明治元年)正月28日在建議迁都的奏摺中說:“一改数百年来的因循腐臭,撇开文武之別,使国内同心一致,深感一天之主皇恩浩蕩,蒼生之民效忠可賴,上下一体,万人感涕,此为今日急务中之最急者也”,并慷慨陈詞地說;除此以外,就“不能揚皇威于海外而抗衡万国”。(“大久保利通文書”第三)。虽然幕府已經推翻,但江戶城还没有陷落,支持幕府的势力还很强大。此时,大久保决不認為人民愚蠢而不足恃。东征的官軍向人民呼吁,声称为拯救万民,使之摆脱塗炭之苦,决定减半課收旧幕府領地的当年租稅^①。东山道鎮

^① 見“復古記”明治元年正月12日条,其实施的例子見“復古外記,东山道战記”第一,正月22日条。